

浅谈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对象 和我国学术界的紧迫课题

蔡俊生

近一、二十年来，文化人类学有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拓宽了研究领域，而且加强了理论深度，已成为一门综合性的基础社会科学。然而我国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仍处于初创阶段。有感于此，不揣浅陋，谈两点自己的看法。

什么是文化人类学？这个问题要从人类学概念说起。

人类学，顾名思义是研究人的学问。人类学包括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分支，体质人类学研究人的生物属性方面，文化人类学研究人的社会属性方面，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但又可以互相分开，各自成为单独的科学门类，就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互相联系又各成系统那样。

然而，这样说人类学岂不就有凌驾于一切有关人的科学之上，甚至囊括、代替一切研究人的自然科学和全部社会科学之嫌了吗？不然。我们知道，当今的各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哲学，都是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有了文字之后建立起来的。虽然各门科学的研究对象几乎都要追溯到尚没有文字记载的那个“史前”历史时期，但真正以史前历史时期为研究对象的却是人类学。研究从大约500万年前至4万年前由动物到人的生物学形成过程，以及4万年前至大约1、2万年前现代五大人种形成等问题的，是体质人类学。与这个漫长历史时期相对应，研究人类社会怎样由作为人类祖先的类人猿联合体一步一步地演变，最终形成第一个无阶级的原始社会（4万年前），以及原始社会的全部文化现象的是文化人类学。这是人类学研究的第一部分基本内容。

由于人类文明的形成以及全部原始文化是一个极其广阔的领域，其情况远比人类体质形态的形成要复杂得多，加之没有文字记载，文化人类学方面的史前文化研究就不能不借助于多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与综合，然后得出与时代科学发展水平相应的结果来。这种研究首先必须借助于古人类学（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根据直立行走、手的解放程度等判断人类劳动产生的可能性，根据人脑和其他器官的发展状况判断思维和语言的形成，还要参照体质形态演变的各个阶段——从南方古猿经过能人、直立人、古人（古智人）到新人（现代智人）——来划分社会文化形成的不同阶段。其次，对史前文化最有发言权的是史前考古学，有的国家（如英国和美国）就曾把史前文化研究直接称做史前考古学。根据考古学上劳动工具的产生及其不断进步的情况，可以判断社会形成和发展的程度；根据各个时代的人类活动遗址及其布局，可以分析当时的社会组织状况；根据各种物质文化遗存，可以知道当时的文

化发展水平。但是，古人类学和考古学资料尽管极其宝贵、相当可靠，毕竟大多是零碎的和残缺的，仅依据这些资料来恢复全部史前文化是困难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欧美国家出现了对世界上的原始民族进行全面系统的社会调查的学问，* 这门学问在欧洲大陆上称做民族学，在英国称做社会人类学，在美国就称做文化人类学。这三个名称都可以归入狭义文化人类学概念，它比我们所说作为人类学一大分支的广义文化人类学概念要低一个层次。为避免相混，这个意义上的文化人类学我们就称做民族学。民族学的出现为史前文化研究提供了活生生的、系统完整的一系列范例，提供了“活化石”。在此实证材料的基础上，才可能形成关于史前社会的理论模型，运用这种模型才能较有把握地统御那些古人类学、考古学以及民族学本身的实证材料，形成完整的史前文化概念。因而，广义文化人类学作为系统的科学认识体系也才能建立起来。事实上，广义文化人类学概念就是由美国的狭义文化人类学概念发展、扩充而来的。

但是，文化人类学的对象并不局限于史前文化。作为人类学的一大分支，它与体质人类学相并行，一直研究到人类的现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苏联等发达国家的民族学和狭义文化人类学开始研究前资本主义的各个民族；近二、三十年来，又进入研究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现代民族及现代民族文化区域。随着这种研究的进展，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也深入到了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在文化人类学方面，除了早已形成的语言人类学之外，新近又出现了经济人类学、宗教人类学、心理人类学、教育人类学、乡村人类学、都市人类学等分支学科，使文化人类学发展成了一个学科组。只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发生了文化人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比如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等的关系问题。我们认为，无论文化人类学还是其他社会科学，从研究对象上说都是研究人类社会，研究的具体领域也确实互有交叉，但研究的角度不同，因而研究的结果和所起的作用也各不一样。文化人类学的中心课题是文化结构（构成一定文化的要素，这些要素的相互关系，这些要素及其关系的动能、价值、运转和演变等），它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一般社会结构相比，显得更具体、更细腻、更丰富，因而也更具有特殊性。文化人类学与历史学研究的角度不同，历史学并不一定要揭示各种文化现象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性，不必对各种文化群体作专门的文化结构研究，而文化人类学则必须解决这些课题。民族学本是文化人类学的组成部分，当研究对象伸展到有文学记载的文明社会时，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仍然比民族学要宽；首先，它仍然必须同时借助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其次，即使是现代社会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比如以上列举的文化人类学的分支学科，象乡村人类学、都市人类学等也明显地超出了民族学的研究领域。随着文化人类学向着现代社会层面的进展，它与社会学的关系更加密切起来。按照当今的观点，新型社会人类学，已经代替民族学成为文化人类学的核心。但文化人类学与社会学本身也还是有区别的。社会学基本上是对当前的现实，进行科学的实地调查，提出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文化人类学的学术层次要高一些，在强调实地调查的同时还必须结合尽可能完备的历史档案，才能得出关于文化结构的相应研究成果。最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一般总是与体质人类学研究结合在一起进行的，就是说总是要同时考察一定文化的物质承担者——人和人类群体的体质形态特征，这也与其他社会科学有所不同。由此

* 这里指本世纪60年代出自英国的结构功能学派，其特点是强调社会深层结构的总体性研究，注重田野调查和跨文化群体的比较研究，其方法与社会学基本一致。

可见，文化人类学并不能代替其他社会科学，其他社会科学也不能代替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有其自身的研究领域和独特的学术价值。

所以，文化人类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其第一部分研究对象是全部史前文化；而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过程中，它的侧重点是在研究一定人类共同体、一定社会侧面的文化结构及其源流。

二

当今文化人类学的发展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拓宽了研究领域，深入到现代社会的各个侧面，形成了众多的分支学科；二是加强了理论深度，越来越注重对社会文化结构的综合性研究，注重理论构建和方法论问题，并形成了众多的学术流派。文化人类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基础社会科学，为哲学、法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提供着重要的理论原则和丰富的科学资料，对解决现代生活中的许多重大实际问题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因此，许多国家都十分重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西欧、北美和日本，重要的综合性大学都设有人类学系，设置文化人类学专业，仅美国就有386所大学设此专业。苏联科学院以及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科学院也大都设有文化学和民族学，亦即文化人类学的专门研究机构，形成了一支相当可观的研究队伍。然而在我国，由于长期受到“左”的思潮的干扰，文化人类学研究一直处于时起时伏、很不健全的状态。解放后文革前，文化人类学领域基本上限于几个分支学科——古人类学、考古学和民族学的研究，而其中的民族学还不研究占人口90%以上的汉民族。80年代以来，虽经许多学者的多方努力情况有所好转，但仍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与国外的形势相比差距反而越来越大。鉴于文化人类学在整个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学术地位，以及它对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学术价值，对这门新兴学科的建设实在应当引起各有关方面的特别重视，否则将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当前，仅从填补学术空白的角度出发，我们认为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课题需要立即开展研究。

（一）学术思想的更新。我国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一直是按照摩尔根、恩格斯的思想理论进行的，近些年来，虽然有个别学者提出些新的见解，但多数学者仍基本上停留在100多年前摩尔根和恩格斯的理论框架上。然而当今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人类学理论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比如摩尔根婚姻家庭发展模式中的血缘婚姻和血缘家庭，早已被事实证明在氏族社会之前是不存在的，氏族社会之后也不具有普遍性，而且所有的外国学者，包括摩尔根的继承人都已接受了这个事实，可是我们最近出版的原始社会史却仍沿用摩尔根的模式不变。我们许多学者自以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然而对婚姻、家庭、亲属制度、氏族、公社等这些纯粹的社会范畴的解释，又往往与生物学范畴（如血缘关系、动物联合体的群体结构等）划不清界限。在这一点上，反而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学者相一致。再比如，近一、二十年来兴起的文化学理论，本来就是由美国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理论方面发展出来的，美国新进化论代表L.怀特(L. White)被誉为“文化学之父”，他的理论大量采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和方法。这种文化学理论还影响到苏联，从70年代开始苏联也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学理论体系。然而，这些情况，我国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语言学家等专门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专家们却很少问津，岂不也证明我们的学术思想陈旧吗？因此我们认为，当务之急是大胆引进国外先进的文化人类学学术思想，对于各种学术流派（新进化学派、功能学派、结构学

派、文化生态学派、文化心灵学派以及苏联的文化学和民族学理论)进行比较研究,给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按照中国的特点形成自己的文化人类学学术理论,并用以武装我国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专家们。这些专家手中有多年积累起来的非常丰富的实证研究成果,一旦与新的理论思想相结合,那就可以大放异彩。

(二)开展对汉民族的文化人类学研究。随着文化人类学研究领域的拓宽和加深,这个问题也越来越显得突出。许多外国学者对我们不进行汉民族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感到难以理解。当笔者问到苏联的汉民族研究家刘克甫(М.В.Крюков)先生为什么研究汉民族时,他回答说,汉民族是世界上历史悠久,所居幅员辽阔,人口最多,文献资料最齐全(从未间断),因而各方面都有典型意义的一个大民族。我国解放前也有学者对汉民族的个别社区进行过文化人类学的调查,近年来又有学者在开展这样的田野研究工作,这都是十分宝贵的。但是在我们看来,系统的汉民族研究还远不止于此。必须把历史资料和田野调查结合起来,必须对汉民族形成、发展、变化的整个历史过程进行分阶段、分区域、分层次的文化人类学研究,研究其各个方面的文化构成及其演变。就象发掘一个时代跨度很长而且内涵丰富的考古学遗址,要列出方阵,分层发掘那样。所以汉民族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是一项极其浩瀚的工程。如前所述,它并不能由研究汉民族的历史学和社会学所代替。说到田野研究工作,我们并不认为必须对每一个乡村和城镇都进行详细的社会调查,但必须对不同的文化区域进行有代表性的典型调查和不同侧面,相当数量的抽样调查,并将这些调查的结果与该文化区域的历史资料结合起来,才能得出合乎科学规律的成果。至于文化区域的划分,本身就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研究工作,非笔者所能一言道出。比如从语言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如果由黑龙江到云南划一条线,这条线左右的汉民族成员相互讲话基本上都能听懂,而我国东南地区的汉民族却形成好几个语言集团,相互用地方语言交谈是难以听懂的,这就是从一个侧面划分汉民族文化区域的一条重要依据。其他如经济、历史、传统习惯、社会心理等,似乎都应当作为划分文化区域的不同侧面的标准并相互结合起来予以考虑。就目前来说,虽然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一些学者已开始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力量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但有计划的全面的汉民族研究工作还没有系统地展开,特别是比之于给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汉民族地区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理论依据的任务,差距还是很大的,而这又确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三)开展对史前文化的综合性研究。这虽是个老题目,但却应在“综合性”上予以更新。

近二、三十年来,有关史前文化的科学资料成几倍、十几倍地增长起来,大洋洲的民族学资料、欧洲的考古学资料、特别是非洲的考古学和古人类学资料几乎每年都有新的进展。另一方面,不少新兴学科参与进来,如灵长动物学的野外考察、动物行为学的兴起、分子生物学的参与等等,都使史前文化的面貌发生着很大变化。然而史前文化研究的特点却在于综合。它不是由哪一个学科或者哪一位专家,只要有了新成果就可以直接摆进去的,而必须依照一定的理论框架对各有关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再认识和再研究,实际上是一个以现代科学发展水平为依据一而再、再而三地复制史前文化面貌的研究过程。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把史前文化研究看作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水平的反映。

可是我国目前的史前文化研究却仍停留在单学科前进的水平上,即民族学家主要依据民族学资料,参照考古学、人类学部分资料,写一部原始社会史;考古学家主要依据考古学资料,参照其他资料写一部原始社会史;而古人类学家又单写人类形成史。这种情况不仅限制

了学者们个人才能的发挥，更主要的是难以实现史前文化研究的信念性要求，因而也没有反映出我国的科学发展水平。为了赶上史前文化研究的时代步伐，建立由各方面专家组成的专门研究机构实属十分必要。比如苏联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就有一个原始社会史研究部，下设几个研究室，其中的研究人员既是民族学家，同时又兼考古学家、或人类学家、或历史学家、或动物学家、或哲学家等等，因而随时可以掌握有关学科的新成果，进行系统的、长期的综合性研究。我国也应当有类似的组织。从科学发展的角度看，建立史前文化研究的专门机构同样是十分迫切的。因为不仅有越来越多的学科参与进来，使任何一门学科的专家都难以单独承担史前文化研究的任务；重要的还在于，几乎全部社会科学和相当一部分自然科学都必须借助于史前文化研究的成果，或者从这里开始，或者与这里有关，而这些学科的专家们自然又不能仅限于对史前文化的片面了解，甚至一知半解。所以，我们决不能忽视史前文化研究的这种重要学术地位。

以上这三个方面当然不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全部，仅仅是笔者认为目前学科建设上急需填补的重要学术空白。至于文化人类学在我国的发展前景，由于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历史悠久的文化大国，那肯定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参考书目：

1. 庄锡昌、孙志民编著：《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构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 苏联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原始社会史》第1卷，《前言》、《序言》和第1、2章，这部分讲史前文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和学说史，即将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3. 中国人类学学会编：《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人类学研究》续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4. [日] 绫部恒雄主编：《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张宛丽